

试析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

黄民兴 张娟娟

内容提要 亚述人起源于两河流域北部,以聂斯托里派和迦勒底教派信徒为主,是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少数群体之一。20世纪初,亚述人深受“民族自决原则”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鼓舞,以“民族”身份凝聚族群,寻求政治独立和族群共同体自治。伊拉克建国后,亚述人延续其独立活动,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拒绝承认其公民身份,从而催生了诸如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挑战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遭遇国家的暴力裹挟和民族同化、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冲击并消解国家认同、库尔德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相抵牾等一系列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在后萨达姆时代,亚述人的认同问题在宗派碎片化和国家政局动荡的情势下进一步复杂化,未来也将继续考验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和族群治理的有效性。

关键词 亚述人 族裔民族主义 族群认同 国家认同 次国家认同

民族主义不但推动了民族认同的兴起与扩散,也助产了民族国家。然而,作为双刃剑的另一面,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对现行民族国家秩序构成挑战,其引发的族裔分离主义更是现代民族国家难以摆脱的梦魇。现代中东多民族国家内部不乏追求自治的跨界族群和宗教少数族裔,他们既接受本族群历史、文化和记忆的规制,^①又经受海内外离散民族主义(diaspora nationalism)的激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认同问题,对所在国家的政治统一、族群团结和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甚至挑战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

在汉语语境中,“Identity”一词有“身份”和“认同”两种译法,“身份”是指某行为主体所具有和展示出的个性与区别性形象;而“认同”则是指行为主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为自己定位。^②身份决定了群体认同的方向,认同反映了群体身份的归属。亚述人(Assyrians)作为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少数族群^③之一,他们通过对“自我”身份的定位而与“他者”相区别,逐步形成了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宗教认同(religious identity)、次国家认同(sub-national identity)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等多重认同意识。然而,以历史文化、宗教身份为核心的族群认同和以政治忠诚、公民身份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就亚述人的个案而言更多的是处于矛盾或背离状态。自1921年伊拉克建国以来,被动进入伊拉克民族国家的亚述人拒绝巴格达政府,否认其公民身份,寻求政治独立,导致族群与国家冲突不断,次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相抵触。亚述族群民族主义者寻求政治自治的行为加深了认同危机,威胁着伊拉克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 本文为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看‘西化’与‘本土化’之争”(项目编号:18JF13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于春洋、陈奥博:《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元影响因素析论》,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3期。

② 何佩群、俞沂暄:《国际关系与认同政治》,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③ 在此,本文将亚述人定义为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族群”(ethnic group)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民族”(nation),一方面是契合中文语境和民族学中对少数群体的辨析;另一方面,伊拉克的官方文件中将亚述人登记为“讲叙利亚语,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族群”,而非阿拉伯人一般的“民族”,故此文采用“族群”(ethnic group,即“同种文化之群体”)。同理,“族群认同”即为“ethnic identity”。

亚述人族群—国家认同的错置伴随着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的整个过程。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学术界对伊拉克亚述人的认同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将伊拉克亚述人归入追求独立的少数群体,强调其族群身份和历史文化权益;^①第二,两次海湾战争后,对亚述人族群—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更多地被萨达姆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和“种族灭绝”议题所掩盖;^②第三,伊拉克战后,国际学术界愈加重视民族国家构建相关问题,学者们将少数族群治理、民族认同等视为当前伊拉克民族构建的核心任务。^③总体来说,一系列讨论关涉族群认同的历史困境和国家认同意识的培育,但对与认同密切相关的“身份认同”“次国家认同”和“族裔民族主义”三大关键问题的探讨暂付阙如。

从理论维度来看,尽管世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认同和次国家认同会对国家认同意识的长足发展造成一些消极影响,^④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也并不只是张力和矛盾的关系,^⑤而是在互动中演化、形塑。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政治变迁和族群冲突表明,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关系并非单纯的族群问题或者威权统治的结果,而更多的是亚述人群体身份和集体记忆与伊拉克民族国家政治框架内族群身份构建的悖论性演绎,也是中东古老宗教少数族裔今日面临的共性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纵向爬梳伊拉克亚述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脉络,分析其认同困境,从而为伊拉克族群—国家关系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思考。

一、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身份和认同维度

正如巴斯所言,“一个民族与其他社会身份一样,既来自外界的认知,也来自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⑥现代亚述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是在近代中东民族意识觉醒、多民族互动以及族裔民族主义的“构建”中逐步完善的。亚述帝国灭亡后,亚述人作为帝国遗民散落在两河文明的历史演进序列中,相继为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统治。然而,“国家不像历史那么古老,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更是疑点重重。”^⑦

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助推下,亚述人问题被归入“寻求独立与生存的民族”和“少数族群与离散族裔”问题。参见 F. David Andrews, *The Lost Peoples of the Middle East: Documents of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Kurds, Assyrians, and Other Minority Races in the Middle East (1920)*, Salisbury: Documentary Publications, 1982; Vahram Petrosian, “Assyrians in Iraq”, *Iran and the Caucasus*, vol. 10, no. 1, 2006; Shak Hanish, “The Chaldean Assyrian Syriac People of Iraq: An Ethnic Identity Problem”,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7, no. 1, 2008.

② Lawrence Davidson, *Cultural Genocide*,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2; Kristen Chick, “Many Christians Flee Iraq While Others Stay and Fight”, *Christian Century*, vol. 132, no. 26, 2015; Colm Campbell, Kirsten Schulze and Martin Stokes, *Nationalism, Minorities and Diasporas: Identity and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1996.

③ Artur Boháč, “Assyrian Ethnic Identit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 *Beyond Globalization: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Regional Context*, Ostrava: University of Ostrava Czech Republic, 2010, pp. 67–72; Shak Hanish, “Autonomy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Iraq: The Chaldo-Assyrian Case”,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0, no. 2, 2011; Niveen Kassem and Mark Jackson, “Cultural Trauma and Its Impact on the Iraqi Assyrian Experience of Identity”, *Social Identities*, vol. 26, no. 3, 2020; Krzysztof Lalik, “Ethnic and Religious Factors of Chaldo-Assyrian Identity in an Interface with the Kurds in Iraqi Kurdistan”, in J. Bochenska, M. Rzepka and K. Kaczorowski, *Rediscovering Kurdistan's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The Call of the Cricket*,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④ 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64—168页;刘中民:《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3期;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⑤ 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2页。

⑥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IL: Waveland Press, 1969, pp. 1–13.

⑦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9: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

(一) 现代亚述人的族群身份与族群认同基础

虽然现代亚述人拥有古老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叙事,但其身份仍然遭受质疑。按照约翰·哈钦森和安东尼·史密斯对“族群共同体”(Ethnic Community)的特质分析,^①现代亚述人属于建立在族裔认同基础上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他们的族群身份和认同基础可分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共同的地理空间或祖籍地是民族想象与建构的主要基底。“土地是使民族实体得以顺利延续的关键因素之一。”^②现代亚述人主要生活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摩苏尔(Mosul)、杜胡克(Duhok)、凡湖(Van)、乌尔米耶(Urmiya)和哈卡里山区之间的广大地区,大致覆盖古代亚述人的活动范围。“共同的地域”作为亚述族群意识寄托的“镜像”,如同“作为(亚述)国家象征的带翼狮子,在文明传承性上代表了一种想象中的民族学联系”。^③这为“亚述人”这一身份的现代叙事建构了合法性。

第二,共同的语言是维系族群认同、族内交流和集体记忆的工具和质料。古代亚述人延续了苏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文明,成为阿卡德语的继承者。公元前12世纪,阿拉米人入侵两河流域,主流语言更新迭代。便于书写的阿拉米语成为亚述人的官方和日常用语。阿拉米字母经过漫长的书写简化和本土化改造,融入了古叙利亚语元素,^④成为亚述基督教会用语。19世纪,亚述基督徒将乌尔米耶(Urmiya)方言与叙利亚语的字母系统相融合,发展出标准的现代书面语,并沿用至今。^⑤19世纪晚期,亚述民族主义精英以“共同的语言”来加强叙利亚语族群之间的联系,强化共同体意识。西方基督教会资助刊发的叙利亚文刊物和报纸帮助强化了这一“民族事实”。^⑥

第三,共同的宗教信仰强化了族裔认同的纽带。公元1世纪,基督教传入,长期生活在两河流域及叙利亚地区的古老族群被纳入统一的基督教信仰系统和“亚述人”标签之下,其中囊括了现代亚述东方教会(又称聂斯托里派,Nestorians)^⑦、迦勒底天主教会(Chaldean Catholic Church)、叙利亚东正教会(又称雅各布派,Jacobites)和叙利亚天主教会(Syriac Catholic Church)。至此,基督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血缘符号,上升为现代“亚述人”广义的身份概念和历史叙事中最具说服力的“证据”。^⑧

第四,西方在中东的文化考古和传教活动激活了古老族群的身份叙事。17—19世纪,西方传教士和民族学家先后进入两河流域,对现代亚述人进行“历史叙事”和“语言溯源”,重新挖掘和考证长期处于多民族交往融合之中的亚述人的族群性和身份意象。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考古学家亨利·莱亚德(Henry Layard)爵士发现了亚述帝国的首都之一尼姆鲁德城遗址,遂将生活在

① “ethnic community”可译为“族群共同体”或“族裔共同体”,其6个主要特质:(1)一个集体性的适当名称;(2)一个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3)共享的历史记忆;(4)与一个具体的祖籍地的联系;(5)一个或多个与众不同的共同文化要素(包括宗教、语言或习俗);(6)成员之间的团结意识。参见J. Hutchinson and A. D. Smith, *Ethnicit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7; [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9—30页。

② 钱雪梅:《民族自决原则的国际政治限制及其含义》,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页。

③ J. Joseph, *The Modern Assy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s Archaeologists, and Colonial Powers*, Leiden and Boston and Köln: Brill, 2000, p. 22.

④ 例如,新叙利亚语中的“Sūrāyā”是由阿拉米语词汇“Sūrāyu”直接通过转换元音而来。参见Sargon G. Donabed, “Rethinking Nationalism and an Appellative Conundrum: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Iraq”, *National Identities*, vol. 14, no. 4, 2012, p. 410.

⑤ 现代亚述语采用叙利亚语字母书写,也被称为叙利亚语,现代亚述人即被称为“说叙利亚语的族群”。参见E. Y. Odisho, *The Sound System of Modern Assyrian (Neo-Aramaic)*,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8, p. 8.

⑥ Robert William De Kelaita, “On the Road to Nineveh: A Brief History of Assyrian Nationalism, 1892-1990”, *Journal of the Assyrian Academic Society* 8, no. 1, 1994, p. 8.

⑦ 431年,以弗所第三次基督教大会谴责聂斯托里派的神学教义,这些教义被叙利亚教会的分支东方教会所采纳。所以从宗教制度来界定的话,“亚述人”既属于东方教会也属于聂斯托里派。

⑧ J. Laessoe, *People of Ancient Assyria: Their Inscrip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p. 36.

当地的基督徒称为“古代亚述人的后裔和最早的基督教派残余之一”。^① 19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的影响下,“亚述人”一词被重新启用。^②

正如史密斯所言:“只有赋予一个集体以专有名称、突出其各部分的统一性,而且该名称被人们广泛接受时,一种独特的族群认同感才会油然而生。”^③“亚述人”这一身份认同不仅是亚述人对“自我”同质文化群体的接纳和保护,也是对抗“他者”异质文化的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河流域的现代民族国家陆续建立,亚述人的“米勒特”社区和宗教边界被打破,蜕化为从属于民族国家的世俗“族群”(ethnic group),迫使民族主义上升为亚述人凝聚族群共同体的主导思想。至此,以政治独立为目标的亚述族群认同和以政治统一为目标的伊拉克国家认同陷入二元悖论之中。

(二) 伊拉克亚述人族群—国家认同矛盾背景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中东的亚述人主体被划入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四国,成为跨界宗教少数族群,其中伊拉克亚述人最多。^④ 现代伊拉克亚述人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及其认同意识的形成,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述族群融入民族国家的过程充满挑战和排异反应。

第一,亚述族裔民族主义者和政治精英的独立主张引发族际矛盾。奥斯曼后期的现代化改革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渗透,帝国境内各宗教团体的自我意识和身份界限逐渐明晰化。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亚述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族裔民族主义,试图通过对地理空间和语言文化的诠释,塑造一个独立于“奥斯曼—伊斯兰”框架的民族群体。^⑤ 在独立无望后,亚述人遂要求伊拉克政府延续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制度,承认其族群共同体的政治独立和宗教文化自由,这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打造的国家民族理念相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要求构成强烈的张力。

第二,亚述人将“民族自决原则”的乌托邦延续到伊拉克民族国家。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亚述人代表团以共同的生存地域为依托,将哈卡里、摩苏尔、迪亚贝克尔和乌尔米耶等地区的聂斯托里教徒、亚述—迦勒底人、雅各布教徒、波斯亚述人、俄罗斯亚述人等统称为“亚述人”,^⑥ 总人数达101.5万余众,^⑦ 以此请求国际联盟支持独立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当局在巴格达附近为流离失所的亚述人建造了难民营。1919年尝试在阿马迪耶划出亚述领地的计划失败后,英国殖民当局于1921年决定将亚述人安置在伊拉克北部。^⑧ 1925年国际联盟调查团出台报告,建议将摩苏

① Austen Henry Layard, *Nineveh and Its Remains: With an Account of a Visit to the Chaldean Christians into the Manners and Arts of the Ancient Assyrians*, New York: George P. Putnam, 1850, p. 258.

② 由于20世纪的“聂斯托里派”一词带有的贬义色彩,故“亚述人”成为东方教会更为常见的代名词,但关于东方教会及其宗教团体开始使用“亚述人”一词的时间尚有争议。约翰·约瑟夫断定“亚述人”这一名称是在19世纪与西方传教士接触之后被采用的。参见 J. Joseph, *The Nestorians and Their Muslim Neighbo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1, 14-15; John Joseph, *The Modern Assy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s Archaeologists, and Colonial Powers*, pp. 3, 9. 其他学者如阿利安·伊沙亚坚持认为亚述土著长期使用“亚述人”这一称谓。参见 Arian B. Ishaya, *The Role of Minorities in the Stat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Anthropology Papers, no. 19, 1977; 19世纪,受西方教会的影响,“东方教会”作为东叙利亚的派生词,可与“亚述人”互用。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亚述人”一般指合称“Assyro-Chaldean”或单独指“Nestorians”。参见 Wilhelm Baum and Dietmar W. Winkl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4.

③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著, 林林译:《族群—象征主义和民族主义:一种文化方法》,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1年, 第55页。

④ 因其流散严重,难以获得确切的亚述人口统计数据,且学界分歧较大。根据“亚述人欧洲联盟”(Assyrian Confederation of Europe)发布的《2018年人权报告》:2003年前,伊拉克约有100万基督徒(其中亚述人占绝大多数)。历经伊拉克战争和“伊斯兰国”武装暴力侵害,剩余人数不足20万。参见 2018 Human Rights Report, *Struggling to Breathe: The Systematic Repression of Assyrians*, Assyrian Confederation of Europe, 1 April, 2019, p. 2.

⑤ R. DeKelait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Assyrian Nationalism*, Master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4, p. 3.

⑥ *Claims of the Assyrians as Presented to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 in Werda*, 1924, pp. 199-202.

⑦ D. Gaunt, *Massacres, Resistance, Protectors: Muslim-Christian Relations in Eastern Anatolia during World War I*, NJ: Gorgias Press, 2006, pp. 405-406.

⑧ George Glasgow, “The Iraqi and Assyrians”, *Foreign Affairs*, Contemporary Review, September 15, 1933, p. 490.

尔划入伊拉克,^①哈卡里山区和土伊边境的基督徒开始大批涌入摩苏尔。^②伊拉克亚述人要求英国当局向费萨尔政府施压,以摩苏尔为中心划出亚述人独立区并承认其民族自决权。尽管已失去划地建国的可能,但亚述人仍坚持宣扬“民族自决原则”,将族群认同置于伊拉克国家认同之上。

第三,亚述人与英国殖民势力合作,希望创建独立的民族国家。1920年4月召开的圣雷莫会议确定了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地位。同年11月,亚述基督徒开始大批应征成为英国殖民当局组建的雇佣军(Levies)。^③他们拒绝融入新生的伊拉克,强调自身的基督教属性,帮助殖民政府镇压阿拉伯大起义和库尔德自治运动,破坏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间的传统关系。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后,亚述领导人又强硬地拒绝费萨尔国王提出的和解方案^④,引爆了1933年的“亚述人危机”。至此,伊拉克亚述人非但没有实现独立的预期目标,反而陷入了“既不属于西方,又不容于东方”的窘境。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来说,这表现出在现代中东民族国家初建时期,尤其是处于英法委任统治之下的基督教少数民族追求独立与民族国家整合实践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

质言之,伊拉克亚述精英在其族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建构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付诸实践。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寻求建国,甘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在国际联盟“调解”无疾而终后,亚述人以追求族群共同体自治为出路,幻想以族群认同来抵御国家认同的冲击。然而,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伊拉克国家整合的大形势下,亚述人势必要直面族群—国家认同的痛苦调和过程。

二、伊拉克亚述人族裔—国家认同的错位表现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使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遭遇了深刻的挫折乃至失败,并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的主要社会文化因素。”^⑤现代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是伊拉克国家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问题曾一度得到缓解,但仍存在诸多矛盾和错位现象,继而从多个层面影响了伊拉克的少数民族治理和民族国家构建。

(一)“基督教认同”挑战公民身份认同

巴斯指出:“族群认同是人们自我归属的产物,其形成贯穿于吸纳和排斥的关系中。”^⑥20世纪初,亚述人的认同边界主要由宗教信仰决定。^⑦他们接受并自视为亚述帝国的“遗民”,通过宗教认同和族裔民族主义塑造自身的身份和文化边界,^⑧加强族群的内部认同。伊拉克建国后,亚述人以基督教信仰区分“自我”与穆斯林“他者”,从身份上认同同为基督教徒的英国人。亚述雇佣军甚至

① “General F. Laidoner’s Report dated”, Mosul, 23rd November, 1925, to 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locality of the Provisional Line of the Frontier between Turkey and Iraq fixed at Brussels in 25th October, 1924.

② 当时伊拉克境内约有4万亚述人,其中75%是来自土耳其的难民,以迦勒底人为主。参见 Norman Bentwich, “Iraq and Its Minorities”, in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10 Great Queen Street, Kingsway, W. C. 2, November 7, 1931, CO 880/50/113.

③ “雇佣军”是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在伊拉克北部招募库尔德人和亚述人等组成的佣兵部队,由英国指挥官控制、殖民地部支付军费,性质不同于伊拉克本土组建的“国民军”(National Army)。“Report on Iraq Administration, October 1920-March 1922”, *Iraq Administration Report, 1918-1932*, vol. 7, pp. 260-261.

④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仲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75页。

⑤ 刘中民:《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第15页。

⑥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著,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页。

⑦ Andrea Irene Laing-Marshall, *Modern Assyrian Identity and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n Explora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he Rise of Assyrian Nationalism, from the World Wars to 1980*,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St. Michael’s College, 2001, p. 2.

⑧ A. D. Smith, “Ethnic Election and National Destiny: Some Religious Origins of Nationalist Ideal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5, no. 3, 1999, p. 336.

“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①他们鄙视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军队,忠于英国军官,辅助委任统治政府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和库尔德地区。普通亚述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伊拉克公民。亚述东方教会主教艾沙伊·西蒙(Mar Eshai Shimon XXIII)直到1932年都没有伊拉克国籍,他也很少与伊拉克当局打交道。亚述民众的请愿一般都是由西蒙呈交给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再由后者负责向伊拉克政府提出。^②亚述人在委任统治期间留给阿拉伯人的印象是“戴着无精打采的帽子和红白相间的头盔,趾高气扬地”为殖民政府服务。^③长此以往,亚述人的这种认同心理和肆无忌惮的行为引来了不必要的族群仇视。

作为回报,英国方面全面参与协调伊拉克亚述人问题。尽管伊拉克承认各宗教团体享有广泛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自由,^④但亚述人的政治归属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英方为了维系为委任统治当局服务的亚述雇佣军,遂敦促伊拉克政府在摩苏尔等地区以小群体形式安置亚述人,^⑤同时将该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处理。^⑥20世纪30年代,英国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委任统治即将宣告终结。1930年6月,《英伊条约》签订,英国要求伊拉克政府承诺保护少数民族,以此作为国际联盟的准入条件。以费萨尔国王为代表的温和派一边承诺,一边继续与亚述领导人周旋。1932年12月,巴格达任命了一名曾在伊拉克军队服役并对亚述人情况有所了解的英国军官就亚述人的定居问题提供建议。然而亚述人对定居伊拉克和作为少数民族融入伊拉克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请求延续以宗教共同体为基础的族群自然状态,由国际社会为其建立一个独立家园或赋予其民族特权。上述请求均遭到巴格达政府的拒绝,亚述领袖、主教也相继被驱逐出境。^⑦

1933年9月,亚述主教前往日内瓦,向国际联盟提交《亚述民族公约》(Assyrian National Pact),要求承认亚述人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而非简单的宗教或种族团体。^⑧但是,亚述人已无法继续获得英国政治庇护和宗教支持,其强硬立场反而招致伊拉克军方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暴力镇压和强制整合。以巴克尔·西德基(Bakir Sidqi)为代表的军方打击亚述人的政治和宗教领导人,血腥清洗亚述人独立运动活跃的塞米勒地区(Simele)。此次事件给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意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亚述人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遭受重创,人口大幅离散,政治社会运动转入地下。随着亚述族裔民族主义运动陷入困顿,亚述人问题国际化以及争取英、美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已不再可能。亚述政治精英和宗教领袖意识到亚述人融入民族国家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遂将注意力和政治目标转移到族裔定居点和自治问题上。

随着英国委任统治势力逐步退出、伊拉克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及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加快,伊拉

① Ernest Main, “Iraq and the Assyrians, 1932 – 1933”,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 1933, p. 665, quoted in Khaldun S. Husry, “The Assyrian Affair of 1933 (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 no. 2, 1974, p. 166.

② R. S. Stafford, *The Tragedy of the Assyrians*, Assyrian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Books Online, 1935, pp. 105 – 109, www.aina.org.

③ Khaldun S. Husry, “The Assyrian Affair of 1933 (I)”, p. 166.

④ Joshua Castellino and Kathleen Cavanaugh, *Minority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92.

⑤ Ernest Main, *Iraq: From Mandate to Independence*, London: G. Allen and Unwin Ltd., 1935, p. 147.

⑥ 请求内容包括:(1)支持亚述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非仅作为伊拉克的一个少数群体;(2)将一些以前居住在土耳其的亚述人划归伊拉克的亚述人社区管理;(3)如以上都不能实现,则应在伊拉克为所有亚述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用以接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亚述人。“Proposal that Certain Assyrians Resident in Iraq should be Settled in British Guiana (1934 – 35)”, 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olonial Office, West Indian, C. O. 884, no. 227, pp. 8 – 9.

⑦ 马修·科普(Mathew Cope)和艾沙伊·西蒙主教先后被驱逐出境(1931年和1933年)。西蒙因拒绝放弃建立亚述人基督教社区的政治诉求而被伊拉克当局剥夺公民身份,被迫流亡他国。伊拉克亚述人内部也因此长期处于领导层缺失状态。“FO 371/16885/E4585/13 August 1933”, Immediate Cable from the British Charged Affaires in Iraq, Ogilvie-Forbes, to FO; George Glasgow, “The Iraqi and Assyrians”, p. 491.

⑧ Andrea Irene Laing-Marshall, *Modern Assyrian Identity and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n Explora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he Rise of Assyrian Nationalism, from the World Wars to 1980*, p. 88.

克亚述人不得不接受其公民身份。1948年,艾沙伊·西蒙正式放弃其民族主义立场,与中东国家进行直接接触。他呼吁全世界亚述人无论身处哪个国家,都要像“忠诚的公民一样”生活。^①此后,亚述人的独立诉求主要由流散境外的离散民族主义者推动。1968年,伊朗亚述人和美国亚述人组成的“亚述世界联盟”(Assyrian Universal Alliance)一度成为全世界亚述人的中心组织,继续为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一个亚述人“民族家园”而奋斗。

(二) 语言文化政策背离国家认同初衷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族群身份维系和认同意识凝聚的基本纽带和象征符号。作为族裔文化群体,亚述人自我认同和保持族群性的基本前提是传承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他们尤其担忧阿拉伯语的普及导致的族群语言衰落和传统文化凋零现象。在英国的干预下,伊拉克政府于1931年颁布《地方语言法》(*Local Languages Law*),第74条规定北部一些地区的通用语言应包括库尔德语或土耳其语,并根据多数原则来决定小学的教学语言。

尽管伊拉克亚述人的许多活动须符合官方要求,但相对宽松的族群文化政策对其传统文化、族群历史、族裔认同以及族群凝聚力的延展意义重大,也为调和族际关系提供了短暂契机。1970年3月,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人达成妥协,赋予后者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权利,承认库尔德语为官方语言之一。亚述委员会(Assyrian Committee)代表人马利克·伊斯梅尔(Malik Ismael)趁机提出给予亚述人同等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族群语言文化权利。1972年4月,伊拉克第251号法令通过,承认“讲叙利亚语的国民”^②享有有限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权利:^③(1)“操叙利亚语”的中小學生必修阿拉伯语,也可自行开展叙利亚语的教育和学习活动;(2)将叙利亚语列入巴格达大学艺术学院的古老语言行列;(3)中央广播电视台、基尔库克以及尼尼微电视台可设立叙利亚语相关节目;(4)政府帮助出版叙利亚语文学作品,创建叙利亚语作家协会;(5)“叙利亚语族群”有开办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俱乐部的自由。

但是,巴格达政府在族群语言文化政策上朝令夕改,前后不一,严重损害了国家信誉,反过来强化了亚述人等少数群体的族群认同,削弱了国家认同意识。为了应对南部什叶派叛乱,确保北部稳定,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Ahmed Hassan al-Bakr)政府很快放弃251号法令,重拾紧缩的文化政策,严密监控全国非伊斯兰教会及少数族群的文化教育活动,^④驱逐外国传教士,强迫教士和修女改宗伊斯兰教,改组甚至取缔亚述人及其他少数族群的宗教和文化活动,原属叙利亚语的广播电台成为复兴党及其亲近党派的专属宣传平台。随后上台的萨达姆大力倡导阿拉伯文化,武力打压亚述人的文教和政治活动,禁止他们在教堂之外使用叙利亚语。^⑤少数族群的文化自由空间因此被大大压缩,亚述人的各类语言文化活动和政治运动陷入低谷。为了适应城市的文化和工作生活,伊拉克亚述人熟练掌握了阿拉伯语、库尔德语或英语,^⑥传统语言文化逐渐衰落。两次海湾战争后,亚述人的传统语言文化基本依赖海外亚述人民族团体所组织的初中级教育活动来维系,流散亚

① Robert DeKelait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Assyrian Nationalism*, Master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4, p. 11.

② 第251号法令中刻意模糊了“亚述人”这一具有身份属性的称谓,而代之以语言文化内涵的“讲叙利亚语的国民”,实质上是否认了“亚述人”的民族身份。

③ Iraq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Granting the Cultural Rights to the Turkman and Syriac-speaking Nationals”, Information Series 58, Depository Number for National Library - Baghdad (774), Baghdad: Al-Hurriya, 1974, pp. 11 - 12.

④ Iraq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Granting the Cultural Rights to the Turkman and Syriac-speaking Nationals”, Information Series 58, Depository Number for National Library - Baghdad (774), Baghdad: Al-Hurriya, 1974, p. 15.

⑤ Middle East Watch, *Human Rights in Iraq (Human Rights Watch Book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⑥ E. Y. Odisho, “The Ethnic,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Modern Assyrians”, *The Sound System of Modern Assyrian (Neo-Aramaic)*,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8, p. 145.

述人反而成为亚述人族裔叙事、语言传承和宗教传播最为可靠的群体之一。

(三) 民族同化政策弱化亚述族群身份

复兴党政府先后推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向美索不达米亚辉煌过去“寻找灵感”,将阿拉伯人打造为两河历史、文化的继承者,淡化古老的土著族群的历史地位,对亚述族裔的历史进行“模糊化”处理,以打造同质化的国民认同和以阿拉伯人为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

在族群治理思路方面,巴格达以“族裔—文化”为分类依据,^①避免对少数族群身份进行具体识别。共和国时期,伊拉克政府在北部基督徒聚集区推进城市化和阿拉伯化运动,试图将亚述人等少数族裔统一纳入“阿拉伯—伊斯兰”社会,进而切断其与祖居地以及库尔德人之间的联系。或强迫亚述人融入或迁入阿拉伯人聚居区,削弱他们与祖籍地、文化遗迹和古老身份之间的联系。^②同时,鼓励阿拉伯人以其强大的文化和经济优势吸纳边缘族群,从而软化族群边界和对立意识,逐步实现民族同构。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获得官方承认的库尔德人形成鲜明对比,亚述人等少数族群因复兴党政府的种种民族政策而面临着严峻的同化危机。宪法规定“伊拉克人民由阿拉伯民族和库尔德民族组成”,否认现代聂斯托里教徒与古代亚述人的身份联系。1977年人口普查中明令禁止将亚述人登记为“亚述人”,^③他们要么被从登记册上删除,要么被重新划定族群身份。1987年的人口普查中,仅有“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两个选项可供亚述人登记。^④伊拉克“亚述人”在官方叙事中进一步失语,其中近1/3人选择流亡或改称“阿拉伯基督徒”。^⑤

至90年代中期,伊拉克北部“有明显亚述人特征的人口不足20万”。^⑥亚述人所占有的农村土地大面积流失,教堂、修道院、学校被改造,牲畜遭没收。失去土地和生活来源的亚述人不得不进城谋生,被动接受阿拉伯文化的“改造”,如以阿拉伯语为日常用语、改穿阿拉伯服装甚至改用阿拉伯名字等。直到2003年,那些不愿更改族群身份的亚述人仍面临失业和被驱逐的威胁。

三、伊拉克亚述人族裔—国家认同的现实困境

现代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族裔民族主义和次国家认同两大挑战。伊拉克亚述人的族裔民族主义长期存在,尤以顽固的离散民族主义最为典型。离散民族主义者长期坚持民族政治运动,为本族裔的宗教文化自由发展和族群共同体的自治权而奔走,干扰伊拉克本土亚述人的国家认同。此外,海湾战争后库尔德自治政府创造的稳定政局和政治文化环境吸引着周边的亚述人等少数族群,使后者逐渐生发出对库尔德政府的认同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亚述人的国家认同意识。

(一) 亚述人族裔民族主义消解国家认同

族裔民族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国家认同向族群认同的回归。^⑦时殷弘教授认为“族裔民族主义

① Heather Rae, *State Identities and the Homogenization of Peop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

② S. Donabed and S. Mako, “Between Denial and Existence: Situating Assyrians within the Discourse on Cultural Genocide”, in Onver A. Cetrez, Sargon G. Donabed and A. Makko, *The Assyrian Heritage: Threads of Continuity and Influence*, Uppsala and Sweden: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 2012, p. 288.

③ Sargon G. Donabed, *Reforging a Forgotten History: Iraq and the Assy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45.

④ R. J. Mouawad, “Syria and Iraq: Repression”,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8, no. 1, p. 21.

⑤ A. Giwargis, “Until When? The Assyrian Ethnicity Persecuted and Marginalized in Its Own Homeland”, *An-Nahar Newspaper*, 1 October, 2002.

⑥ L. J. Yacoub, *Minorités: quelle protection?*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1995, p. 241.

⑦ 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第162页。

与一国社会内部的种族、部族、民族关系及其涉及的语言、宗教、文化和政治分裂密切相关”,它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在于“族裔性的局部认同,政治、文化甚或经济的分离与对立,连同对于民族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希求。”^①伊拉克亚述族裔民族主义主要分为两类,即主体位于伊拉克的本土族裔民族主义和由海外流散亚述人发起的离散民族主义。它们都“代表并维护民族的自治、统一和身份”,^②但二者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前者拒绝“建立自治国家”的激进路径,与中央及库尔德地区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倡导和平对话,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代表权。而后者以建立亚述自治区为目标,严厉批评复兴党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和暴力行为,呼吁全世界亚述人联合起来,援助孤立的伊拉克亚述人同胞。

随着全球化和跨国人口流动加速,现代亚述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群体成员对自身的认知和定位也有所改变。长期以来,亚述人的共同经历辅助巩固了其族群身份,这一族群意识随着移民进程而在流散者身上得以强化。亚述移民的后代渴望被承认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生存能力的族群。^③他们在寄居国创建族群政治和文化团体,延续其族群宗教、语言、文化和传统节日,加强集体记忆和族群历史教育,关注祖籍地同胞的命运,声援甚至参与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对民族国家权威构成挑战。例如,1983年贝特纳哈宁民主党(Bet Nahrain Democratic Party)就提出《亚述人民族宣言》(*Assyrian National Manifesto*),要求将“亚述自治州确定在摩苏尔省或杜胡克省”。^④90年代,散居美国的亚述人宣称:“我们(亚述人)的最低需求是创建一个以杜胡克、安卡拉以及摩苏尔省为中心,并与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划界而治的自治区。”^⑤

可见,族裔民族主义对国家认同意识的祛除是带有普遍意义的。^⑥亚述离散民族主义的回潮更会直接冲击和弱化亚述人的国家认同意识。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亚述人继续面临着资源被剥夺和社会地位被边缘化的窘境,这进一步刺激着离散者的焦虑情绪。因此,离散民族主义者采取措施,加大族群凝聚力度以挽救濒临溃散的族裔群体和身份认同。类似“在尼尼微平原为我们的人民指定一个行政区,让其他民族和宗教团体参与进来”^⑦的宣言不绝于耳。亚述人争取族群权益的过程也难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随之而来的国际人道主义谴责和外来干涉迫使伊拉克政府做出让步,族群—国家关系因此变得敏感而脆弱。

(二) 库尔德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相抵牾

亚述人处在中央与库尔德政府资源及地盘争夺的灰色地带。早在伊拉克王国时期,生活在摩苏尔及库尔德斯坦边缘区的亚述人就归库尔德人管辖。长期以来,亚述人或受到库尔德人的牵制和压迫,或频频陷入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的冲突漩涡,致使其长期在伊拉克国家认同与库尔德政府认同之间摇摆,深受拉扯之困。尽管历届亚述领袖都希望在这两种认同之间实现平衡,为亚述族群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但事实表明,这是一种难以达成的政治理想。

巴格达与库尔德地区长期的军事冲突冲击了亚述人的国家认同。20世纪60年代,库尔德人发动反政府运动,对周边的少数民族群施以威逼利诱,以图壮大抵抗力量。受此影响,亚述人分裂为

① 时殷弘:《论族裔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涌动和局部泛滥》,载《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1期,第17页。

② A. D. Smith, “Ethnic Election and National Destiny: Some Religious Origins of Nationalist Ideals”, p. 333.

③ Madawi Al-Rasheed, *Iraqi Assyrians in Lond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thnicity*, Lewiston and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98, pp. 81 - 82.

④ S. Dadesho, “The Assyrian National Ques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 A Historical Injustice Redressed”, *Bet Nahrain*, 1997, p. 275.

⑤ George Habash, *What Do the Assyrian People Want?* UK, 1999, <http://www.aina.org/articles/habash.pdf>.

⑥ 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第162页。

⑦ ISDP-Iraq Sustainable Democracy Project, *Proposing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Art, 125 Solution: Establishing the Nineveh Plain Administrative Unit*, 2008, p. 2, <http://www.iraqdemocracyproject.org/pdf/NPAU-policybrief.pdf>.

“亲库派”和中立派。库尔德独立运动失败后,“亲库派”亚述人遭到伊拉克政府的轰炸和亲政府的库尔德人攻击。70年代,不甘失败的库尔德人接受外来势力的经济和政治支持,趁南部什叶派叛乱之际再次向中央政府施压。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库尔德人趁机寻求政治独立,与伊朗政府里应外合,直接威胁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复兴党政府为防止更多的亚述人倒向库尔德阵营,尝试拉拢中立的东方教会力量压制“亲库派”亚述人。政府不仅恢复了流亡主教西蒙的公民身份,还邀请他前往巴格达协商亚述人的权益问题,提议组建一支“亚述警察”部队以威慑库尔德人,遭到了亚述领导人的拒绝。1988年2月23日至9月6日,萨达姆政府发动“安法尔行动”(The Anfal Campaign),^①以亚述人“拒绝注册为‘阿拉伯人’或‘库尔德人’”^②为由,对“背叛国家”的库尔德人和拒绝合作的亚述人施以无差别的军事清洗。在这场不对等博弈中,成千上万的亚述人遭到身心重创、人口损失,族际关系极度恶化,这与伊拉克促进国家认同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整个复兴党统治后期,亚述人明显更倾向于支持库尔德地方政府。

库尔德政府利用库尔德人与亚述人镶嵌分布的地缘优势与中央政府展开竞争。1991年,库尔德人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逐步扩大自治权利,向周边少数民族提供相对宽松的族裔文化认同空间和非暴力环境,将“库尔德斯坦”打造为亚述人等族裔除国家认同之外的另一个认同选择。1992年库尔德自治区建立后,伊拉克基督教政党和文化社团成倍增加,基督教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得到库尔德政府的认可,每年8月7日被认定为“塞米勒大屠杀纪念日”和亚述人的法定节日。在部分亚述人看来,这一举动意在默认库区亚述民族主义活动的合法性。整个20世纪90年代,尼尼微平原的亚述政治家们与库尔德斯坦保持密切联系,亚述人在库区议会的代表比例维持稳定,政府中甚至有几名亚述部长。^③

伊拉克战争后,4个基督教派别^④加入了库尔德联盟,占有其中的5个议会席位(该联盟共赢得104个席位)。^⑤库区住房与环境部部长采取了若干举措促进现代叙利亚语的教学、叙利亚语刊物的出版和亚述人文化协会活动的举办。曾出任库区财政部副部长的亚述人萨尔基斯·阿加扬·马蒙多(Sarkis Aghajan Mamendo)得到库区政府的支持,致力于重建基督教村庄,接纳流散各地的基督徒,特别是深受社会暴乱和宗派战争迫害的亚述人。在他的推动下,仅在杜胡克地区就建造了约120个基督教村庄。与此同时,马蒙多还出资建造教堂、学校、孤儿院、神学院、修道院和主教住所等。2006年以来,库区的基督徒人数成倍增长,目前已超过10万—12万人。^⑥此外,库尔德政府在“伊斯兰国”(IS)入侵之时向其辖区内和有争议地区的基督教少数群体提供安全庇护,与亚述人在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培养新一代亚述人对“库尔德斯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⑦长此以往,伊拉克亚述人对库尔德自治政府的次国家认同势必赶超其对巴格达中央政府和国家的认同。

① Sargon G. Donabed, *Iraq and the Assyrian Unimagining: Illuminating Scaled Suffering and a Hierarchy of Genocide from Simele to Anfal*,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0, pp. 190 - 191.

② “Genocide in Iraq: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 (1993), 2014, pp. 19 - 25.

③ “Genocide in Iraq: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 (1993), 2014, p. 182.

④ 分别是亚述民主运动(Assyrian Democratic Movement)、迦勒底文化协会(Chaldean Cultural Society,总部设在埃尔比勒)、贝特纳哈宁民主党(Bet Nahrain Democratic Party)和迦勒底民主联盟(Chaldean Democratic Union)。

⑤ Herman G. B. Teule, “Christians in Iraq: An Analysis of Some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Middle East*, vol. 88, no. 1, 2012, p. 181.

⑥ “The Status of Christians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in Iraq: A Short Report by the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UK Representation”, December 2009, http://www.brk.org/uploads/documents/Status_Christians_Kurdistan_Region_Dec_09_2009_12_22_h16m26s&6.pdf.

⑦ Krzysztof Lalik, “Ethnic and Religious Factors of Chaldo-Assyrian Identity in an Interface with the Kurds in Iraqi Kurdistan”, pp. 246 - 247.

(三) 教派分权加剧族群—国家认同分裂

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形势脆弱,法律尚未健全,巴格达的教派分权模式加剧了宗派主义冲突和权力争夺。公民原有的国家认同遭到部落、族群和教派认同的侵蚀,宗教少数群体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也处于变动中。尽管亚述人在战后获得了相应的政治代表权,但在族群人口和社会势力上仍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相对剥夺感”有所增强,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显得更为脆弱。^①

首先,伊拉克新政府及其宪法有“故意制造”亚述人群体分裂的嫌疑。巴格达将亲政府的迦勒底基督徒纳入政治体制,以代替全体亚述人发声,忽略了亚述东方教会的代表权。2003年7月底,在代理政府职能的临时管理委员会(临管会)的25名成员中,基督徒唯一的席位由迦勒底政治家约拿丹·坎纳(Yonadam Kanna)出任。2004年6月公布的99位即将参加伊拉克国民议会的代表中,5名基督徒代表均为迦勒底人。^②同年8月,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千人国民政治会议选出的81位民选议员和19名前临管会成员中,包括了64名阿拉伯人、24名库尔德人、6名土库曼人和4名迦勒底人,亚述东方教会一席未获。此外,2005年《伊拉克宪法》第121条取消了《临时宪法》中的“迦勒底—亚述人”这一称谓,将土库曼人、迦勒底人、亚述人等并列起来,恢复了亚述基督徒的传统称谓,按宗教派别划分族群,割裂了“迦勒底—亚述人”的族群集体身份。

其次,宪法赋予亚述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在实践中被剥夺。2005年宪法第41条承诺亚述人等少数民族“根据其宗教信仰、教派选择享有相应的地位和自由”。但在同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伊拉克的文件草案清单中抹去了“亚述人”这一选项,要求该群体登记为“阿拉伯人”。宪法虽有“保障少数民族拥有宗教和信仰自由权利”的条款,但2016年的《国民身份证法》第26条出台新规,强调非穆斯林父母的未成年子女必须信奉伊斯兰教。此外,由于2005年的宪法制定仓促,其中并未涉及保障少数民族生存以及反对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条款,因而在2006—2010年的伊拉克教派暴力冲突中,亚述人等基督徒被视为“西方代理人”或“使伊拉克陷入国际人道主义责难的危险分子”,继续遭受社会歧视和人身攻击。

四、余 论

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而族群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单元。因此,强调国家认同并非要否认或消除族群认同,而是要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总体来说,族群认同必须服从并巩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促进族群发展和族际和谐的政治保证。当代中东族群数量众多,族际关系复杂。因此,身处多民族国家的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不仅是族群归属问题,更是伊拉克在伊斯兰框架和民族国家框架下对族群问题认识不清晰、族际关系处理不成熟的表现。

诚然,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的认同是多元而复杂的,但也是随着时代情景而变迁的,任何一个族群都不是“被特定文化界定的人群孤岛”。^③因此,伊拉克中央政府应当明确矛盾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对象,以便及时、准确地调整族群治理政策。其一,亚述人的认同具有多层次性,因而推动伊拉克亚述人的国家认同首先要尊重其族群认同,具体而言即尊重亚述人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宗

^① 于春洋、陈奥博:《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元影响因素析论》,第88页。

^② Vahram Petrosian, “Assyrians in Iraq”, p. 142.

^③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7, no. 5, 1965, p. 1215.

教传统、群体差异及生活习惯,以缓和其矛盾对立情绪,弥合族际分歧。其二,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具有长期性和顽固性,因而需要适时调整政策,将亚述人充分纳入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轨道,使其同等参与,改变其社会边缘化趋势。其三,民族国家构建或者民族国家认同的最终目的在于加强国家最高权威,提高民众向心力。而一味地对少数民族实施暴力“规训”并非良策,寻找并制定适合国情的族群政策和整合路径才是重塑健康的族群—国家认同关系的出路。

总而言之,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既反映了伊拉克国家族群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也是现代中东宗教少数民族的普遍遭遇,当下亦难有恰当的解决范式,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继续影响伊拉克的国家重建进程。

Abstract The Assyrians, who origin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Mesopotamia valley, are mainly Nestorians and Chaldeans, making one of the largest Christian minority groups in Iraq.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ssyrians, inspired by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nationalist thoughts, sought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for their ethnic community by uniting the ethnic group with a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Iraq, the Assyrians continued their quest for independence, cooperated with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ir citizenship, thus giving rise to a series of ethnic-national identity problems, such as ethnic identity and religious identity challenging national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being subjected to state violence and national assimilation, ethnic nationalist movements undermining and eroding national identity, Assyrian identity to the Kurdish government conflicting with national identity, etc. In the post-Saddam era, the Assyrian identity dilemma has become further complicated in the context of sectarian fragment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which will continue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and ethnic governance in Iraq.

(黄民兴,教授;张娟娟,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西安,710127)

[责任编辑:于红]